

威廉·莱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之比较

章道德

(皖南医学院 思政部,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威廉·莱斯与马克思都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某种关联,生态危机的背后蕴涵着人与人的关系,但两人也有诸多的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思维方式上,威廉·莱斯采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马克思采用感性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起点上,莱斯则立足于消费异化,马克思则立足于生产力;批判路径上,威廉·莱斯采用意识形态的批判方式,马克思则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式。

关键词: 主客二分;感性实践;政治经济学批判;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 B 56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3-0030-04

威廉·莱斯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生态自然观是对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控制自然观念背后蕴涵着人与人相互控制的社会关系,立足于消费异化的时代新变化去阐释生态危机,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然而稍加仔细分析,会发现威廉·莱斯与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有所区别,威廉·莱斯既有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新突破,也存有一些误解。我们为此把两者的自然观加以比较,发现有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分别是逻辑运思、逻辑起点和批判方式。

一、思维方式:主客二分与感性实践

莱斯引用并扩展了马尔库塞对自然的划分,把自然割裂为两个部分,即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把内部自然称之为对人的控制,也称为对其人性的控制;把外部自然视为对人之外的外部环境的控制。莱斯把自然分为两部分之后,试图论证人类在对外在自然的控制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其内在自然,也就是对人性的控制,并认为我们应当从自然中看出人与人斗争的实际图谋。但要反问的是:我们承认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有利于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因为人类与自然从最初的物我不分到近代的主客二

分说明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明晰,但是否意味着人与自然可以分离?是否存在着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这两个自然?如果分离之后,发展到极致,人以自己为主体,很容易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这一点莱斯似乎没有细加考察。莱斯可能主观上并没有想把人与自然分隔开来,但在客观上却陷入了二元论的思维窠臼,而且他对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实践等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真正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自然条件分为两类:“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在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与威廉·莱斯的思想有类似之处,都把自然分为两种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可实际上是否真的如此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人类的抽象自然,马克思并不是否定外部自然,而是说一个抽象的外部自然对人类来说没有意义。马克思肯定了自然对人具有先在性,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因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45}。但马克思并没有拘泥于认识论的思维框架,采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与自然这个整体截然分开,而是通过实践这个中介^①来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统一。人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自然界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皖南医学院中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微时代’对90后大学生文化心理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wks201515)

作者简介:章道德(1988-),男,皖南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E-mail:zhangdaodechizhou@163.com

中索取一定的资源。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需建立在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采取拷打和征服的态度，随意攫取自然资源，忽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限度。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人类通过实践改造与改善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的对象，从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总之，马克思认为主客之间的矛盾不是到纯粹思维里去寻求答案，而应联系人的感性实践加以考察和检验。

综上所述，威廉·莱斯与马克思都看到了控制自然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是两者的逻辑运思有所不同。威廉·莱斯从主客二分的角度去考察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而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只是相对的，而且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主体决定客体，客体主体化，客体刻有人类实践活动的印迹；另一方面，客体制约主体，主体客体化，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改造，以此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其次，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及上述的理论冲突只有通过人的实践力量才可能被克服。因为，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不存在对人来说“无”的自然界。对人而言的自然界，必定是经过实践改造过的纳入人的活动之中的，但不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不仅与人本身，而且与自然都处在疏离的状态之下，因而应当通过实践去改变不合理的异化状态，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二、逻辑起点：异化消费与生产力

莱斯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需要作出新的阐释。莱斯从消费与满足的角度考察了生态危机。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2]10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鼓励人们消费，造成人们形成消费等同于幸福的错觉，因而要不断地消费，幸福感才会越强。然而，消费的盲目扩大会导致生产的盲目扩大，它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造成了一个“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而这

会进一步导致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把自然看作满足需要的资源库，可以随意开采、挖掘和拷打。为此莱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一，改变控制自然的观念，从“控制自然”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第二，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第三，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它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目标在于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因素的重要地位，把人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2]112}。第四，建构新型的社会制度，改变少数资本所有者控制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

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生态自然观的演变：在原始社会，“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屈服于自然界。”^{[1]81-82}之所以出现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血缘、图腾等约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与此同时人类对控制自然的进程加快，人们争当自然的主人，把自然当作商品，随意开采和破坏，从而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的逻辑本性导致的生态灾难（资本的逻辑本性在于追逐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最为关键的是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照光”，这一逻辑决定了它反生态的本性）以及由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正常的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化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3]916}马克思对此提出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

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81]}。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威廉·莱斯主要是从时代的新情况即需求这个角度去考察生态危机,马克思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去考察的。两者都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有所不同的是莱斯虽然提出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表达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观点,他的解决方案,既没有具体的施工主体,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模式。不论是他提出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还是他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在消费活动”及其人性或伦理价值观的变革等,都只是停留在纯粹的形而上学批判之上,仍然局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中。我们知道如今的生态危机已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或一个社会的内部问题了。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制,生态危机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如当下的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不就是此种表现吗?

三、批判路径: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莱斯认为通过控制自然观念的解蔽即可解决生态危机,而控制自然的观念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人性的解放,二是伦理价值观的重塑。莱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势必造成自然的反抗,而自然的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反抗。因此,我们需对人性的反抗加以抑制。至于价值观重塑问题,莱斯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制度,鼓励人们的批判能力。莱斯试图通过重新阐释控制自然观念这种意识形态以及主张通过伦理或道德的发展去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问题,但他规避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反而认为经济危机已被生态危机所取代,也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

危机的同质性进行考察,更未采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上。简言之,莱斯试图用意识形态批判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企图通过重塑“伦理价值观”来解决现实的全球性生态困境,从而陷入了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之中。莱斯及其后来的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认为通过意识形态的自明性即可解决生态危机,从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意识形态的问题需追溯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去考察,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我们应当从物质世界本身中去寻找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不是沉浸在自我意识或单纯的理论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意识批判须建立在四个方面关系的考察之上。首先,人类为了生活,必须首先考虑吃、喝、住、穿等最基本的需要。其次,“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在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79]}。再次,是人本身的生产。最后,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再生产。通过四个方面考察之后,我们可知,精神与物质是相互联系的,精神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外观,它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说不能忽视生产方式的重要影响。

总之,马克思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才能分析和认识控制自然观念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深层根源。简言之,只有深入意识形态的背后地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可能消除全球性的生态困境。

四、结 语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莱斯的分析是极有成效的,研究视角也是独特新颖的,但他对生态危机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莱斯与马克思在思维方式、批判的视角以及解决方案上不尽相同。莱斯虽然提出了控制自然观念和异化消费这两个新视

角，然而他存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解决方案的乌托邦倾向等问题。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人性的改变固然重要，但意识形态本身需要追溯到社会存在中去，而且意识形态本身也需要加以扬弃，我们并不能仅仅满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通过单纯的观念批判并不会导致观念本身的改变，必须从观念的地基出发对之进行批判。总之，我们需要把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既需要用理论去解释世界，更需要用实践去检验理论，用实践去改变、改善世界，而不是如莱斯一样把现实世界的生态危机归结为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可解决，也不是远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脱离现实的

生活，或对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加分析与考察，而是直面当下，切中社会现实，检讨、反思现代化，分析资本、消费等诸多因素对生态危机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LEISS W.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kingston and montreal[M].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Nature of William Leiss and Marx

ZHANG Dao-de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ublic and Public Education,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William Leiss and Marx both think that there is an inevitable relevancy between ecological crisis and capitalist system, hence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behind. In fac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evident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William Leiss adopts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while Marx uses the perceptual practice. Leiss takes the consumption alienation as hi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Marx focuses on the productivity. In the path of criticism, William Leiss maintains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but Marx employs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 theory.

Key words: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he perceptual practic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change

【编辑 吴晓利】

注释:

①德国哲学家施密特认为自然和社会是双向中介的，自然中介社会，社会中介自然。(参看A·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赵鑫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8.)人与自然、历史等相统一，必须借助中介，因为人类面对的对象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然，而是经过劳动实践这个中介与自然相联系的。